

云南高等教育史

封海清 张磊◎著

地方教育史的研究和写作很容易陷于区域的狭窄视野或就教育论教育的点状思维陷阱。我们尝试把云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放在全国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放在云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观察和理解，以尽可能地避免认识的误区。因而本书对全国教育发展政策背景及云南经济和社会变迁节点、政策的制定予以较多考量，以期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云南高教发展变化的社会基础和时代特征。



科学出版社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2011年重点项目(JD2011ZD08)

云南师范大学省级重点学科“教育学”建设基金资助项目

云南高等教育史

封海清 张磊◎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云南高等教育通史，立足中国教育及云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全面展现了从明清书院教育到改革开放时期云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历史图景，可以使读者尽览云南高等教育的艰难曲折与多彩辉煌。本书以严谨的历史学方法，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多方考辨，不但复原了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史，而且对云南高等教育史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并研究了学界未曾涉及的一些方面。本书既有助于促进云南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和教学，又有助于整体把握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对于云南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也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适合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及管理的人员、高等教育学科的研究生，以及对云南教育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高等教育史 / 封海清, 张磊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03-059753-3

I. ①云… II. ①封… ②张… III. ①地方教育—高等教育—教育史—云南 IV. ①G649.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7116号

责任编辑: 朱丽娜 刘曹芄 崔文燕 / 责任校对: 韩 扬

责任印制: 徐晓晨 / 封面设计: 润一文化

编辑部电话: 010-64033934

E-mail: edu_psy@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12月第一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5

字数: 500 000

定价: 1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古代云南的高等教育 // 1

第一节 古代云南教育的发展 // 3

第二节 明清时期云南的书院教育 // 23

第二章 近代云南社会经济变迁与高等教育的发端 // 53

第一节 云南近代经济的变迁与工业化的起步 // 55

第二节 云南近代社会变迁 // 68

第三节 “癸卯学制”实施后云南新型教育体系的建立 // 81

第四节 云南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端 // 85

第五节 云南近代高等教育的标杆——云南陆军讲武堂 // 89

第三章 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云南高等教育的艰难发展 // 99

第一节 民初云南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 // 101

第二节 东陆大学的建立 // 106

第四章 高校内迁与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高等教育 // 115

第一节 高校内迁云南 // 117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 // 138

第三节 抗日战争期间高等教育对云南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促进 // 155

第五章 改造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的云南高等教育 // 179

- 第一节 解放初期对云南各高校的接管 // 182
- 第二节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造 // 185
- 第三节 院校结构的改造——院系调整 // 188
- 第四节 学习苏联——教育制度与教育模式的改造 // 197
- 第五节 20世纪50年代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 // 204

第六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云南高等教育 // 213

- 第一节 云南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 // 215
- 第二节 云南高等教育在调整改革中发展 // 218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的云南高等教育 // 248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 // 264

第七章 云南省高等院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 269

- 第一节 云南研究生教育的起步（1950～1966年）// 271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研究生教育的发展（1978～2000年）// 272
- 第三节 云南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287

第八章 云南的留学教育 //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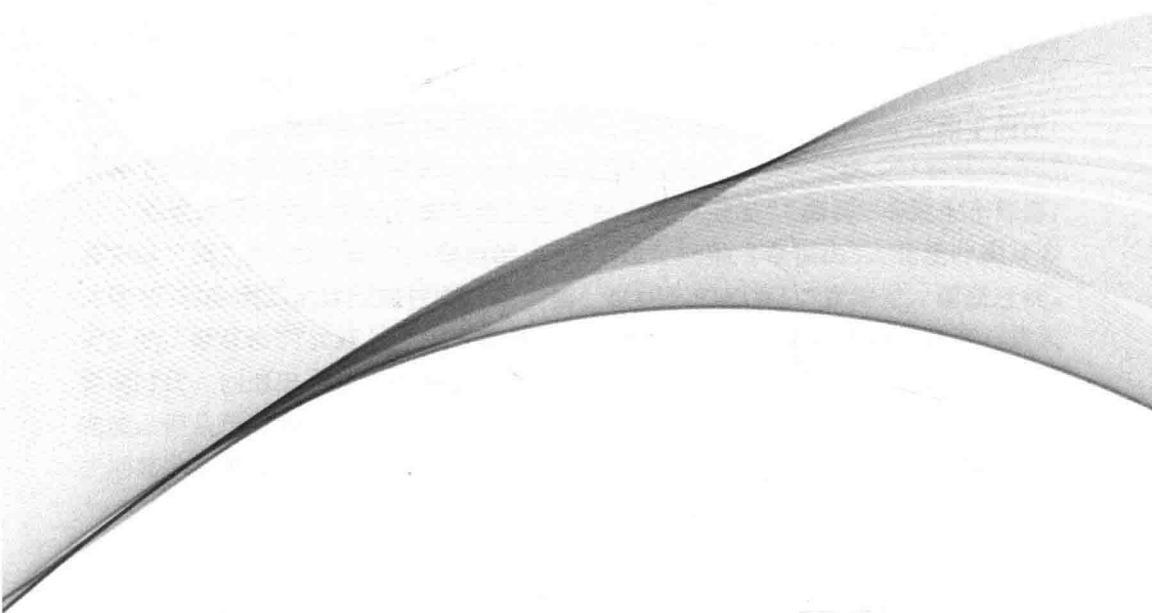
- 第一节 清末云南的留学教育 // 293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南的留学教育 // 298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留学教育 // 307

云南高等教育大事记（截至2000年）// 312

后记 // 393

第一章

古代云南的高等教育



第一节 古代云南教育的发展

一、汉唐间云南教育的艰难起步与迟缓发展

(一) 关于云南教育源头的考辨

清康熙时期，云贵总督范承勋在其《改建省城府县学宫记》一文中曾言：“云南有学始于汉章帝元和二年，其说存，其地未可深考。自汉以下，历时兴替，亦未有定所。迨元而建置始可考焉。”^①这段话一方面说明云南以儒学为主的学校教育开始于东汉；另一方面说明，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清朝，人们对于元朝以前的云南教育已因史料之不足征而无法详细了解。

所以在没有获得新的材料之前，对于云南教育的历史我们虽可上溯于两汉，而真正可以了解其整体面貌的，还是只能起自元代。

春秋战国时期，滇池及周围地区分布着“滇”“劳浸”“靡莫”等数十个部落，其中以“滇”为大。“耕田，有邑聚。”而“西至同师（今保山），北至叶榆（今大理）”的今滇西地区则居住着“名为嵩、昆明”的部族，“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②，还处于以原始畜牧业为主的阶段。而此时期滇池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创造出了以农耕为主的青铜文化，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的分工已经完成。但从已发掘的考古文物看，在西汉中期以前滇池地区青铜时代的第一、第二期墓葬随葬器物中，“不见中原地区传入的器物”^③。这些都说明此时期云南和

① 周钟岳等：《新纂云南通志》卷132《学制考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8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91页。

③ 王大道：《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云南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7页。

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不甚密切，因而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不大。总体发展水平的低下使教育未能成为独立的社会部门。综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尚无反映学校教育出现的信息。

但是，中原文化在云南的传播及教育活动并未完全中断。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始楚威王^①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②庄蹻王滇后，积极传播内地文化，“以声教诱服诸夷，夷人皆悦”^③。这是目前可见的最早在云南开展中原文化教育的文字记载。冯甦为清初云南官吏，所说不知所据，但庄蹻入滇后将中原文化传播于云南应是顺理成章之事，冯甦所记不应是空穴来风。

自汉武帝经略西南以后，云南的儒学教育开始逐渐形成。但究竟发端于何时，迄今为止这还是一个真伪错乱、莫衷一是的问题。

倪颯《滇云历年传》卷2云：“司马迁立讲堂于叶榆，为滇云讲学之始。”^④此说源于司马迁之经略西南夷的传说。据方国瑜先生引司马迁《自序》考证，司马迁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曾‘远略’昆明，但未尝至其地。更无‘立讲堂’之事”^⑤。倪氏所说出于附会。

另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是汉武帝时叶榆（今大理）人张叔、盛览因师从司马相如而成为云南最早的儒学传播者和教育家。云南教育史研究成果多采用这一观点。较有影响的《云南省志·教育志》《云南民族教育概况》《云南教育简史》《云南教育史》等均持此说。其所本均为明代李元阳所撰万历《云南通志》，主要依据为以下四条。

第一，卷1《地理志一》：元封二年，“以中郎将司马相如持节开越嶲，按道侯韩说开益州，授经教学，今云南有古汉学基”。注“见《南中志》”。

第二，同卷又云：“元封二年，使司马相如入西夷，冉駹、叶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士人盛览从相如学，归授乡人，文教之开始此。”

第三，卷11《人物志第七》，“盛览”注引《古今书尺》云：“（盛览）字长

① 楚威王在位时期为公元前339年～公元前329年。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认为庄蹻入滇事在楚顷襄王时期（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2年）。刘琳先生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中经考辨亦认为其事“应在顷襄王之世”（第338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93页。

③ （清）冯甦：《滇考》卷上，《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史地文献》第10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4页。

④ （清）倪颯：《滇云历年传》卷2，云南省图书馆藏翻刻本。

⑤ 方国瑜：《〈史记·西南夷列传〉概说》，《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通，叶榆人。学于司马相如，所著有《赋心》四卷。有司马相如答书云：‘词赋者，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第四，称引《太平御览》：“张叔，叶榆人，天资颖出，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思变其俗。元狩间，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负笈往，从之授经，归教乡人。”^①

李元阳此说一出即被广泛采用，谢肇淛的《滇略》、冯甦的《滇考》、倪蜕的《滇云历年传》、师范的《滇系》及清代康熙、乾隆、道光年的《云南通志》等皆从之，遂使影响广泛。

实际此说纯属子虚乌有。早在1958年，方国瑜先生就撰文指出：李元阳所说是出于附会和虚构，并没有这些事实。其理由如下。

第一，据《西京杂记》卷2，盛览为“牂牁名士”，牂牁设郡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而司马相如卒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8年），那时还没有牂牁郡。

第二，李元阳称引《太平御览》，“但检《太平御览》无此文”。

第三，张叔事实套取《汉书·文翁传》故事的虚构。^②

在方国瑜先生考辨的基础上，我们再按李元阳的说法逐条做进一步的分析：李氏所言四条材料，除第三条材料来源于《西京杂记》卷2“百日成赋”条外，第一、二、四条均未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两汉及以后史籍，不知其所本。

第一条材料据李元阳言，来源于《华阳国志·南中志》。然查《南中志》，有“相如持节开南中，按道侯韩说开益州”，并无“授经教学”等语。查《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附《韩说传》，韩说元鼎六年因“击东越有功，为按道侯”，无开益州事，《汉书》同。

第二条材料谓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司马相如“入西夷”，致使冉駹、叶榆等请为内臣。然在出使时，司马相如为回击反对经略西南夷的大臣及坚定汉武帝的决心，曾写下《难蜀父老书》，载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该文起始即言：“汉兴七十有八载”，当为汉武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早于元封二年20年，且元封二年司马相如已辞世9年矣，何来入西南夷？李元阳所言相如出使时间有误。《史记》本传载：唐蒙略通夜郎后，邛、笮君长皆欲内附，汉武帝“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

①（明）邹应龙修，李元阳：《云南通志》，云南省图书馆藏万历四年刻本抄本。

② 方国瑜：《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学》。《方国瑜文集（第一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51页。

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①这说明司马相如略定西南夷较为顺畅，仅到蜀地，即因给予大量财物而使邛、笮、冉、駹、斯榆的部落酋长内附，相如并未到若水以西、以南。而且，“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②，即司马相如被人举报出使巴蜀时受贿，因此被免职。因而司马相如在彼时既没有机会也无心收盛览、张叔为徒。

第三条材料说盛览“学于司马相如，所著有《赋心》四卷”，则与其所本之《西京杂记》有所出入：《西京杂记》“百日成赋”条下云：“其友人盛览，字长卿。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必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博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敢言作赋之心矣。”^③是盛览自知不如司马相如而终身不敢作赋，何来《赋心》四卷？

第四条材料述张叔从司马相如学经事，通览《太平御览》未见有关于叶榆张叔负笈师从司马相如学经的记载。方国瑜先生已指出其实乃套取《汉书·文翁传》故事而虚构出叶榆张叔。《汉书·文翁传》载：“孝景末，（文翁）为蜀郡守……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一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④李元阳实据此而张冠李戴且加以演绎。其实，早在修撰《新纂云南通志》时，周钟岳等已指出鄂尔泰《云南通志》将《文翁传》中的蜀郡小吏张叔事迹混入的错误^⑤。但最早混淆张叔者，还不是李元阳。民国《大理县志》卷27《艺文部三》中收录有明人高崧所作《大理乡贤祠记》，即有“大理古梁州域，汉置郡建学，张叔从司马相如授经，归教乡人，而乡献自此始”之说。大理乡贤祠由大理知府汪标主持修建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早于李元阳撰写《云南通志》近百年。李元阳之说盖源于此。

据此而言，所谓张叔、盛览负笈师从司马相如学经之说多为附会与杜撰，极不可靠。蔡寿福《云南教育史》称“据《太平御览》载，叶榆人张叔，叶榆人盛览‘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负笈往，从之受经，归教乡人’”^⑥。实属谬传。

（二）汉唐间云南的学校教育撮要

当然，李元阳的错误及后人的误信谬传并不能说明西汉时期云南尚无学校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46～3047、3053页。

②（晋）葛洪撰：《西京杂记》卷2，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③（汉）班固：《汉书》卷89《文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5页

④周钟岳等：《新纂云南通志》卷188《汉至元耆旧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4页。

⑤蔡寿福：《云南教育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2～133页。

教育。经过汉武帝自建元至元封三十余年对西南夷的经略，特别是在设置牂牁、越雋、犍为、益州四郡后，中央政府对云南的直接管辖覆盖了云南的大部分区域，汉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的教育政策势必波及云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在郡县设置地方官学的政策恰恰源于文翁早期在蜀郡的实践。《汉书·文翁传》：“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史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飭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始云。”^①蜀郡建立地方官学体系的办学模式可以北上影响汉代中央政府，亦可南下而影响毗邻的云南。

东汉时期云南已有学校教育。《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肃宗（章帝）元和中（约公元85年），蜀郡王追^②为益州太守，在滇池地区“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③，是为云南开办地方官学的最早记载。清代同治时期云南巡抚岑毓英在《改建大理太和学宫碑记》中亦云：“考诸《府志》，大理有学，始于汉元和三年。”^④

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东汉）明、章之世，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载此事，惟时间记为桓帝时。这是云南学校教育起源的另一个说法。牂牁郡毋敛，经考证多认定为今贵州正安县或独山县。清代郑珍的《遵义府志》说：“凡属牂牁县，无地不称先师”，可证乡人以其为贵州先贤。然亦有人认为云南省富源县为其故里，依据是富源在清朝就建有“尹珍故里”牌坊。无论其籍贯在哪，因尹珍一生从事教育，其影响波及牂牁全境，惠及云贵是可以肯定的。

亦常有学者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于昭通白泥井出土的东汉《孟孝琚碑》所载孟孝琚“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来佐证，至少在东汉时期，云南已建立了官办学校，开始了规范的学校教育。但孝琚“随官”受诗，是指在其父为县令的武阳（今四川彭山），并非在云南，因而似不能以此证明云南或昭通地区当时已有完备的儒学教育。但孝琚学《韩诗》以前应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其父为官前更应有较好的教育基础，当来源于今昭通地区的学校教育。

① （汉）班固：《汉书》卷89《文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5页。

② 方国瑜先生查阅《太平御览》卷261引《后汉书》作“王阜”，并据《华阳国志》《东观汉记·王阜传》确认“王追”为笔误。见前引方国瑜先生文。

③ （南朝）范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7页。

④ 周钟岳等：《新纂云南通志》卷132《学制考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4页。

⑤ （汉）常璩：《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380页。

上述史料共同反映了东汉时期云南在昆明、大理、曲靖和昭通地区已出现以儒学为主的学校教育。

东汉以后到元朝以前，云南教育的状况则尚未发现有较详尽的记载，所关史料多从侧面反映了学校教育仍在实施。《华阳国志·大同志》载：西晋“(太康)五年(应为三年，282年)，罢宁州，诸郡还益州，置南夷校尉，持节如西夷，皆举秀才贤良。”^①《爨宝子碑》载：“州主簿治中别驾，举秀才，为郡太守。”事在东晋安帝时期。《爨龙颜碑》亦载爨龙颜“举义熙十年(414年)秀才，除郎中”。^②这些都说明两晋时期云南已实行察举制，察举秀才、贤良。察举制至东汉虽有地方官挟私以售的弊病，但对于被举荐之人仍有文化标准方面的要求：东汉阳嘉元年，顺帝规定：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应选”，此后之察举“变荐举为课试”^③。据此，被荐举为秀才贤良的前提是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由此可以看出，云南的学校教育仍在进行中。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教育也在延续之中，惜无史籍详载，但亦可从史籍中看出端倪：

《滇载记》云：细奴罗之孙“晟罗皮之立，当(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立孔子庙于国中”^④。立孔庙具有宣示官方价值观的象征意义。既要奉儒学为主臬，则必须以儒学教育为基础。至晟罗皮之孙阁罗凤时，又以相州(今河南安阳)郑回为子弟师。《新唐书·南诏传》载：“郑回者，唐官也……阁罗凤重其淳儒……俾教子弟。”^⑤阁罗凤之子凤迦异、孙异牟寻都曾以郑回为师学儒学，因此“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是为郑回传播儒学于南诏王族。《樊古通纪浅述》载：劝丰佑天启五年设立学校：“是年，唐武宗改元会昌。建二文学，一在峨蓑，一在玉局山，为儒教典籍驯化士庶，以明三纲五常。其教主为杨波远、杜光迁、杨蛮佑、郑回等。”^⑥则劝丰祐时期已建有儒学学校。

南诏时期，教育上尤为值得大书特书之事是派遣子弟到其他地区求学，开云南对外交流学习之先河。

《新唐书·南诏传》：“贞元十五年(799年)，异牟寻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韦皋，时为唐剑南西川节度使)，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⑦孙樵《书田将军旁事》亦云：“南康公(韦皋)凿清溪道以和群蛮，俾由蜀而贡，又择群

① (汉)常璩：《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615页。

②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8页。

③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74页。

④ 杨慎：《滇载记》。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57页。

⑤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上《南蛮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71页。

⑥ 尤中校注：《樊古通纪浅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页。

⑦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上《南蛮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72页。

蛮子弟聚于锦城，使习书算，就业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①

大规模的交流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唐宋间云南人好书法，崇奉王羲之，《元史·张立道传》：“先是云南未知尊孔，祀王逸少为先师”^②，其风习实源于此番交流学习。元李京《云南志略》“白人风俗”条载：“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蛮文曰‘保和（南诏劝丰祐年号，为唐宝历、太和年间）中，遣张志成学书于唐’。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陶宗仪《书史会要》：“张志成，云南大理樊人。蒙氏保和年间，遣张志成学书于唐，有晋人笔意，故今重王羲之书。”《明环宇通志》卷111亦载：“张志成，昆明人，唐太和间入成都，学王羲之草书归，国人多习之。”此事可见南诏派遣学生入唐学习影响之深远与广泛。不唯如此，樊绰《云南志》卷9：“凡试马军须五次上”，即“马军”的选拔考试须测试五场，五场考试通过方为合格。其中，第五场考试即是“能算能书为一次上，试过有优给”。对军人考试也有书算的要求，说明此时南诏民间书算教育已较为普及。

正因为如此，一旦唐王朝减少或停止了对来唐求学的资助，就会引起南诏的强烈不满。《资治通鉴》卷249宣宗大中十三年载：“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廩给……杜惊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祐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嵩州而还。又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③为减少开支，唐中央政府试图减少南诏学生，而致使南诏强烈不满，由此不惜与唐交恶。所谓“不逊”之辞，《唐语林》卷2有载：“词云‘一人有庆，方当万国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之费。’”南诏在这一事件上的愤怒，恰恰反映出南诏领导人对于子弟求学蜀地的重视程度。

北宋建立后，太祖赵匡胤着力应对北方边事，无力南顾，且“鉴唐之祸基于南诏”，没有发展与大理国的关系。《续资治通鉴》载：“（王）全斌既平蜀，欲乘势取云南，以图献，帝（宋太祖）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④此即为“宋挥玉斧”。云南与内地的关系渐为疏远，再无入蜀求学之事，但大理国的儒学教育仍在继续。《滇载记》《南诏野史》均记有段正淳时（宋徽宗初），入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亦载乾道癸巳（1173年）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到广西横山卖马，同时求购《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

①（宋）姚铉：《唐文粹》卷100。《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集部》卷19923，台北：世界书局，1985年影印本。

②（明）宋濂：《元史》卷167，《张立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916～3917页。王逸少，即“书圣”王羲之，羲之字逸少。因唐太宗喜好其书法，遂风行于唐。南诏遣子弟求学于蜀，风习濡染，遂使王羲之名重于云南。

③（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9，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78页。

④（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4《宋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89页。

语》、《三史加注》、《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及佛教书籍。由此可见，汉文化教育，特别是儒学教育仍在大理国进行，否则无人能读懂这些书，也就没有求书、购书的需求。元初郭松年著《大理行纪》言：“（大理国）自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取士，多出此辈。”^①由此可证大理国确有学校教育。

二、元明清时期云南教育的体系化、规模化发展

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一改唐宋对云南以朝贡制度为纽带的羁縻政策，而实施直接统治的治理方式。采取行省制、屯戍制、“土流兼治”、“改土归流”和儒学教育制度，积极清查人口，广泛征收赋税，推行屯田，开采矿产，使中央政府的统治深入云南边疆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各级教育体系建立，元明清时期云南的教育进入了体系化、规模化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云南教育始终是以政府主导，所以其教育体系也主要是以官学为主体，而民间办学则处于补充、辅助的地位。其教育体系可以分为儒学、社学、义学和书院。

儒学，又称庙学，是对应科举的官办学校教育。按行政辖区设置府、州、县学。在军队集中驻扎地，则设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卫儒学。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则设置宣慰司儒学和安抚司儒学。儒学以“诵诗书，习礼仪”为主要教学内容，按礼、乐、射、御、书、数分课教学。为管理好儒学教育，中央政府专门设置学官，在府设立教授，州设学正、训导，县设教谕，“掌教诲所属生源，训导佐之”。

社学，元代已有，是古代以民间少年儿童为教育对象的学校机构，主要设在城镇、乡村地区，招收8~15岁的学龄少年儿童。每50家设社学1所，以承担民间子弟的启蒙教育，使之掌握日常知识、伦理规范、行为习惯及法律常识为主要任务。明代吕坤作《社学要略》云：“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②基于这一目标，社学的教学内容有别于儒学：学生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童蒙教材，再学习经、史、历、算及律令、冠、祭、婚、丧等礼。

义学，又称义塾，是面向贫困子弟和少数民族子弟提供初等教育的学校，公益性特点显著。对于义学的诞生，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北宋范仲淹所创的宗族义学：“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起宗族。又设义学，教养咸备，意最近古。”^③义学有官办、民办、官民合办之分。明清时期纳入官方管

①（元）郭松年：《大理行记》。王叔武：《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② 转引自（清）陈宏谋：《养正遗规》，《五种遗规》译注小组译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237页。

③ 李修生：《全元文》卷240，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75页。

理体系中，至清代则官办官管的特点尤为突出。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普遍设置义学，以“识字明理”“开化夷民”为教育目的，以“训以官音，教以礼仪，学为文字”为教育内容。

书院，兴起于唐宋之际，是具有私家自由讲学特点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明代以降，书院受官府控制甚严，基本上被纳入官学教育机构。书院没有严格的地域和生员额数限制，学无定制，员无定额。

明清两代的教育体系基本一致，没有太大差别。惟自晚清以降，随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中国教育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发生了较大的变革，清末“新政”后，中国的教育体制及教育内容均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元代云南教育体系的形成

云南教育真正得到较大发展并形成体系始于元朝。忽必烈灭南宋后，在云南建行省，开始了中央政府对云南的直接管理。云南建行省，脱离了四川腹地的管辖，表明云南在全国逐渐显露其重要地位。忽必烈十分重视对云南的统治，“镇之以亲王，使重臣治其事”，先后派其子忽哥赤、重臣赛典赤·赡思丁和他的长子纳速刺丁任云南王或行省平章政事，加之将统治中心由滇西迁至滇中昆明，使云南得到快速的发展。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赤为首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积极开发云南，并注重提高云南人的文明程度，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的发展。当时，“云南俗无礼仪，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统稻桑麻；子弟不知书。赛典赤教子跪拜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已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讲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①。

至元六年（1269年），元王朝即构建了以中央“国子学”和地方的路、州、县学组成的完备的官办教育体系。至元十九年（1282年），“命云南各路皆建学，以祀先圣”^②。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忽必烈“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③。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云南行省右丞忽辛“乃复下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文风大兴”^④。

在中央和行省两级政府的推动下，云南初步形成了府州一级的地方官学教育体系。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赤治滇之初，出于“夷俗资性悍戾，瞽不畏义，求所以渐摩化服其心者，其惟学乎”的认识，“乃捐俸金，市地于城中之

①（明）宋濂：《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063页。

②（明）宋濂：《元史》卷81《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32页。

③（明）宋濂：《元史》卷17《世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60页。

④（清）岑毓英等修，陈灿等纂；光绪《云南通志》卷125《忽辛传》，云南省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北偏，以基庙学”^①，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建成中庆路大成庙。其事亦得力于时任中庆路总管的张立道。《元史·张立道传》载：“（至元）十五年，除中庆路总管，佩虎符。先是云南未知尊孔，祀王逸少为先师。立道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土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帅诸生行释菜礼。”^②此后，元代在中庆、大理、临安、澄江、仁德、威楚、武定、丽江、永昌九个路府及安宁州、石屏州、嵩明州、邓川州、鹤庆州设置学宫，云南的学校教育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延祐元年（1314年），元王朝为管理云南各级教育机构，专门设立了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

云南学校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云南教育发展的基石，为提高云南人民的文化素质、促进内地文化向云南各民族的传播及巩固国家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其官学推广的地区主要还是集中于今滇中、大理、红河等较发达地区，师资水平与学生文化水平也较低，与内地相比，总体上仍较为落后。皇庆元年（1312年），元王朝实施科举考试。天启《滇志》卷8《学校志》序云：“今考旧志，终元之世，所载科甲之选，仅仅五人焉。”^③云南进入会试的每榜录取名额只有5人，其中，蒙古2人，色目2人，汉1人。据党乐群考证，整个元代云南考中进士的仅有6人。^④从中可窥见当时的云南教育尚处于落后状态。

（二）明代云南教育的发展

明王朝甫建，为巩固其统治十分重视教育。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即提出发展地方教育的思想：“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⑤出于同样的目的——稳定边疆，明王朝建立初期就十分重视边疆地区的教育。

但对于云南教育的管理和推进却远远晚于内地。盖因对云南的直接统治滞后。明初云南仍处于元梁王巴匝剌瓦尔密的控制之下，而少数民族上层首领又拥兵自重。直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领30万大军南下进讨，才实现了对云南的严密控制。通过实施卫所制度，中央王朝向

① 郭松年：《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卷1。《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② （明）宋濂：《元史》卷167《张立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916～3917页。

③ （明）刘文征：《滇志》卷8，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75页。

④ 党乐群：《云南古代举士》，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⑤ （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6页。